·学术批评·

“百城赋”与古典文体的百年际遇

王树森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20世纪以来,受制于从宏观社会氛围到具体语体环境的巨大变革,赋体一度受到冷落。“百城赋”以规摹古代赋体尤其是古代都邑赋为职志,从结构到语言到内容等多个方面都注意吸收传统赋体文学经验。它的出现,既是对赋体文体功能与特性的重新检阅,也反映出官方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百城赋”的文本本身还存在着语言杂糅、韵律散乱、书写受限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予以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百城赋”;启示;期待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4-0035-07

作为古代都邑赋乃至于古代赋体文学的现代复兴,《光明日报》开辟的“百城赋”专栏自2007年3月7日甫一推出,便受到了读者和专门研究者的关注。毋庸置疑,由《光明日报》这样一个在文化界和整个社会均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平面媒体主导,如此集中地,采用赋这样一种古典文体来铺写当代中国城市胜概,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百城赋”推出之后,社会各界的讨论相当热烈。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专题论文即有余恕诚的《都邑赋的历史贡献与生命力》(2007年11月30日)、杜晓勤的《汉大赋·都邑赋·百城赋》(2008年1月4日)和赵成林的《盛世写华章,老树著新花——从“百城赋”谈辞赋的生命力》(2008年9月26日)。在江西,甚至还召开了关于“百城赋”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百城赋”的影响之大。本文试图将“百城赋”的出现,纳入过去一百余年间赋体发展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集中谈一谈它的相关启示,并就一些今后似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一己之见。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一、20世纪赋体文学发展及其成因简述

赋,原为中国文苑中一类最具民族特色,且源远流长的古典文体。早在汉代,以《子虚》、《上林》、《两都》、《二京》为代表的京苑大赋,便以其“体国经野,义尚广大”(《文心雕龙·诠赋》)的巨丽之美,赢得了包括君主在内的高层政治人物的激赏,客观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恢宏盛世,从而成为“一代文学”之宗。此后,虽然在五七言诗歌、词、曲、小说等后起文体的映衬下,原先笼罩在赋体头上的光芒稍显暗淡,但一方面,汉赋从题材命意到创作方法上所积累的诸多艺术经验给后代文学的发展施以了有益的沾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某些影响赋体发展的制度、文化和心理因素所具有的超稳定结构,使得从两汉至明清的两千年里,赋体文学的创作始终未见衰歇。仅据清人陈元龙所编《历代赋汇》中远非全璧的搜罗统计,截至明末的以赋名篇的作品,就有3800余篇。而晚清署名为鸿宝斋主人编纂的《赋海大观》,收赋竟达12000篇。其中,仅清赋就超过了8000篇。由此可见这种古典文体在中国传统社会确实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这一古老文体却并未能重续辉煌。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

[作者简介]王树森,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吉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

初随着国门的打开,新事物的涌现,也出现了一些像《海运赋》、《电报赋》、《眼镜赋》等名篇,对辞赋题材做了前所未有的开创,显示出赋这一旧文体对主动适应新世界的积极态度;尽管当时像章太炎、徐震、黄侃等一批旧学硕儒也曾创作过《哀山东赋》、《游峨眉山赋》和《宫沟秋莲赋》等一批既备才情、又见学养的辞赋作品,甚至在1940年代尚为初中学生而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谭家健也曾有过模仿《二京赋》而创作《衡阳赋》的"幼稚"之举①。但是不可否认,这些星星之火并未能在根本上改变那一时期赋体创作的寥落。

新中国成立以后,赋,更因其与封建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受到冷落。倒是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出现过一批以赋名篇的白话散文。如《人民日报》在六十年代初就曾开辟过"名城赋"专栏;而杨朔和峻青的《茶花赋》和《秋色赋》则更加引人注意。前者甚至被冠以"杨朔模式"的名号。改革开放以后,幸存下来的峻青又陆续创作过《雄关赋》、《三峡赋》、《沧海赋》等作品,而文风宏肆的王蒙也曾有过《苏州赋》②。

对于这批以赋名篇的白话散文,究竟该如何定位呢?早在1927年,郭绍虞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在指出赋体经过短赋、骚赋、辞赋、骈赋、律赋和文赋这样几个发展阶段之后,曾有过大胆预测:"赋体演进的历史,是否便止于此呢?……赋体屡经变迁的缘故,很多受当时文体的影响。……则当现在语体盛行的时期,不应再有语赋——白话赋——的产生吗?"③郭氏是明确提出"白话赋"概念的第一人。而当"名城赋"和《秋色赋》这样的作品出现以后,郭氏又为旧文写了一段"附记",中云:"本于论文不拘形貌,于是认为不妨有语赋之目。……解放以后,《人民日报》又一度特辟'名城赋'一栏,而如孙峻青同志的《秋色赋》,更可与《秋声赋》媲美,这又是白话的散文赋体了。此文在当时,不过是为了不赞成用'散文诗'或'小说的诗'的名称,故立语赋之目,到现在,则幸而言中,旧时臆度,竟成事实。"④可见他是赞同"白话赋"这一概念的。而且毋庸置疑,这批"白话赋"无论是从结构模式还是语言风格上看,都借鉴了"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成文"(《文心雕龙·诠赋》)的传统赋体的艺术经验,但是它们毕竟和传统赋体差别太大。无论是语体的"白话"与"文言"之分,还是体裁的"韵文"与"散文"之别。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传统赋文的上述特性在它(按,指白话赋)的身上,可谓荡然无存。"⑤若纯粹从尊体的角度着眼,不为无见。

为什么和此前的两千年相比,20世纪赋体文学的创作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呢?个中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文学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近年来,学界对这个问题有过一些有益的探讨⑥。综合诸家意见并结合自身思考,可以作出几点概括:首先,20世纪缺乏有益于赋体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素有"盛世作赋"的文化传统。"盛世"不仅可以为赋体文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心理氛围,还可以提供诸多可以入赋的现实素材。但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华民族有大半时间是在战争、动乱、贫穷、困顿中渡过的。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显然制约了文化的发展与建构。其次,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白话代替文言的语体变革,使得赋这种原本依赖文言语体的古典文体在如何实现现代转型上出现窘迫,前述"白话赋"即是证明。第三,20世纪的社会变革使得原本为赋

①谭家健:《成章中学杂忆》,文载《光明日报》2007年12月4日。

②《人民日报》1988年11月17日。

③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④曹明纲:《赋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⑤曹明纲:《赋学概论》,第265页。

⑥参见程章灿《古典文体的现代命运——以二十世纪赋体文学观念及创作为中心的思考》(收入其《赋学论丛》,中华书局,2005年版);许结《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和《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载《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等。

体所依赖的诸多制度性因素被迅速解构，这也不利于赋体文学的发展①。第四，在20世纪狂飙突进般的社会变革中所形成的对于传统文化的某些态度，也难免让赋体因身上所背负的特殊色彩而难以自处。

不可否认，赋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确与封建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当章学诚提出“庙堂文学”和“山林文学”的概念时，赋，特别是那种京苑大赋，很自然地就被纳入“庙堂文学”的范畴。但是，在章氏那里本来并不存价值判断的两种概念，到了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那里，就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1917年，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坚定的文学革命立场。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并说：“《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②赋被当做批判矛头，无论是文体品格还是艺术特性，都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质疑。时过境迁之后，我们似乎无须再对前人的这些论断过度指责，应当充分考虑到他们发论的具体语境，应当充分认识到在20世纪特别是前半期那样一个中华民族以救亡图存为第一要务的大的历史背景下，一切激烈的举动都应被历史地看待甚至被理解原谅，赋应该服从并且作出牺牲。

然而，“文学的民族形式不等于旧文学，任何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完全抛弃民族形式。”③人们所深感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原本有条件、有余裕以一个平静的心态来打量包括赋体在内的一切民族文化遗产，但是在“民族性”让位于“阶级性”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在一次又一次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运动的冲击下，甚至于在杨朔、峻青等人明显因过甜而显得空洞的“白话赋”创作的映照下④，这些遗产的应有尊严被打压殆尽，也给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增加了对于赋这种传统文体的误解。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公开批评赋是“弄臣文学”，“胎里带着阿谀本性。”⑤不能不让人沉重，在这种时代和心理氛围下，赋自然很难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百城赋”的成绩与启示

值得欣慰的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要求重新审视、估量传统文化的呼声愈来愈高，并且日益由民间的自发行为向政府主导的自觉行为转化。赋体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方面，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辞赋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对象。学者们一改以往对其批之过深的传统思路，开始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对其展开研究。涉及到赋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赋史与赋学批评的研究和赋学专题与范畴的研究等诸多方面，这无疑有助于从各个角度深化对这类传统文体的认识。另一方面，从1990年代以来，一些“崇雅好古”之士开始从事赋体创作，魏明伦、颜其璘、许孔璋等人就是突出代表。然

---

①赋体文学之所以能在中国文苑绵延日久，除了它自身的艺术魅力之外，首先应当得益于它所依附的相关制度。如汉代的献赋制度，唐宋金元的科举试赋制度。明清两代，虽然纯粹的科举试赋渐渐减少，但是在其他一些选拔人才的场合，仍然有试赋之举。如清代的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翰林院的考试都有大量考赋的例子。而所有这些制度因素，在20世纪都未能延续，参见许结：《制度下的赋学视域——论赋体文学古今演变的一条线索》。

②陈独秀：《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98页。

③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页。

④程章灿说：“杨朔和峻青的‘赋’体散文，其主题表现倾向是比较相近的，那就是明显具有传统赋所具有的歌德颂圣的倾向，虽然某些作品风格颇为雄强刚健，总的来说，其文章滋味终不免偏‘甜’”。见其《赋学论丛》，第233页。

⑤秦援晋：《辞赋有别》，文载《北京青年报》2000年3月20日。

而,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所进行的单纯的学术研究,其辐射范围毕竟有限。而后者的创作虽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是一则创作的实际成绩仍然不够突出,二则他们的创作都似乎还停留在纯个人行为的阶段,换言之,就是并未获得官方话语的认可。更兼这些创作或多或少地因与商业宣传有关而沾上了一些"铜臭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种自发性的文体复兴探索的效应。

而"百城赋"则明显不同,由《光明日报》这样一个在文化界和整个社会均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主导,如此集中地,采用赋这样一种古典文体来铺写当代中国城市胜概,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百城赋"中,几乎每一篇赋作都是由各个城市的宣传部门牵头组织的,有些城市甚至进行了盛况空前的征赋活动①。这就使得这次活动具有明显的官方色彩,显示出官方话语体系对于传统文化的新的判断。

关于"百城赋"的艺术特点,已经有相关文章做了专门探讨,总体说来,这批赋作都以规摹古代赋体尤其是古代都邑赋为职志,从结构到语言到内容等多个方面都吸收了传统赋体文学的经验。

先看体制。"主客问答"是刘勰总结出来的关于赋体的重要体质特征。汉代的几篇骋辞大赋就主要采取这种模式,如《两都赋》中的"西都客"、"东都主人";《二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等。汉代以后,只有在都邑赋题材中才较多地沿用这种主客问答体制。而"百城赋"中,则有不少赋作沿用这种体制。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陈洪的《天津赋》、王禹的《澳门赋》、霍军的《酒泉赋》等。以《天津赋》为例,赋首云:"丁亥仲夏,日丽风和。有盘山君者,邀九河伯、渤海若,品茗于长城脚下,银杏荫中,汤过三道,果献数盘,主客怡然,言笑晏晏。"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这是仿照《子虚》、《上林》中所设的"子虚"、"乌有"、"亡是公"。值得注意的是,《天津赋》所设置的人物称谓、聚会场景都打上了非常明显的地域印记,这在《酒泉赋》和《澳门赋》中也有明显体现。

再看语言。有些赋文文辞相当优美。如《南京赋》:"悠悠淮水,阅尽千年兴衰;峨峨钟山,铸就旷代雄杰。吴宫花草,迥忆英豪大略;晋代衣冠,长缅王谢雄才。有情数台城,依旧三春杨柳;无赖是东山,占尽九秋明月。清溪九曲,隔不断痴情一片;竹林七贤,衬映出风韵六朝。"对偶精工,用语典赡。还有些赋作注意语言的变化,四六句、五七言句乃至于骚体句,交替使用,读来古色古香,饶有趣味。

再看内容。清代孙梅曾言:"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四六丛话》)在古代都邑赋中,举凡一个城市及其相关区域的自然、人文、历史、日常起居、典型风俗等等,都必须顾及,"百城赋"显然也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一般说来,先从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得名之由谈起,然后顺次述及它的前代先贤、当世英杰,然后再谈此地的江山胜迹、典型产业、乡风民俗,最后归结到对于当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歌颂中。即以林丽珠的《厦门赋》为例。此赋一开始即说厦门为"天然良港。群峰拱护,雄踞东南要隘;碧海回环,扼守八闽门户。"然后又转而描写诸多带有亚热带气候特点的植物,接下来就开始追述厦门的悠久历史,以及涌现出来的诸多厦门籍或曾经与厦门有过联系的明贤俊彦们,最后集中歌颂新时期以来厦门的巨大发展以及所获得的荣誉等等。这也是"百城赋"在内容铺写上的基本思路。

"百城赋"的出现及广受关注,可以深化对赋体体性和功用的认识,这里打算谈两点。

首先,"盛世作赋"的文化传统被再次印证。班固《两都赋序》既回顾了西汉以来赋体发展的历史,也概括了赋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各项文体功能,这应当是关于"盛世作赋"的最早表述。在此后的两千年的古代社会里,几乎每逢盛世,都会有一次作赋的高潮。其实,不独古代社会如此,现代社会也如此。即拿十七年文学中的两次白话赋创作而言,其出现的时间,一为五七年反右前夕,一为六一年六二年间,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点,

①如芜湖市就曾由市委宣传部牵头,专门举行征集活动,随后又邀请驻芜相关高校的专家学者进行评议、修改、润色,《光明日报》还专门就此作了《一赋征得万人心》的专题报道。

正如程章灿所言:“政治气氛比较宽松,社会环境比较宽容,条条框框也有所减少”,因此“适合于被王蒙比喻作文学的‘微笑’的散文的发展。”①而峻青和王蒙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创作的白话赋,更是对于刚刚走出困境的祖国的由衷礼赞。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中华民族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恢宏盛世。这样的盛世,需要得到应有的赞歌。赋这种古典文体,能够在这时被想起并被重新拾起,更充分说明,“盛世作赋”的文化传统已经深入人心。《光明日报》在“百城赋”的“开栏的话”当中曾这样表述:

> 天地形胜,城以盛民,而文明兴焉。一个城市就是一本历史,记录着这块土地的风雨兴衰,见证着这里人民的智慧创造。从天南到漠北,从东海到西疆,灿若星河的中华名城叙述着泱泱华夏的辉煌,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传统在创新中传承,文明在行进中壮大。幸福安康,勤劳勇敢的人民和他们绚丽多彩,日新月异的城市,科学发展,共建和谐,一同推动着中国历史巨轮的滚滚向前。今天的城市,是欣欣向荣的中国的缩影。
>
> 盛世方写华章!大汉盛唐,是所有炎黄子孙最骄傲的印记。繁荣昌盛的汉唐气象,蕴育了汉唐歌赋的磅礴恢宏。又逢盛世,何妨且歌且赋?沐浴在城市光辉中的人们,身感幸福,际遇和谐,心为之动,而后赋成。

将其与班固《两都赋序》对读,更可见“百城赋”本质上就是当代社会对“盛世作赋”文化传统的一种自觉的集体赓续。

其次,赋体被证明有很高的知识性作用。《汉书·王褒传》中有这样一则有意思的记载:“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其中说赋体可以达到“鸟兽草木多闻之观”的目的,即可看作是对赋体知识功用的深刻体认。此后,历代多有将赋体当志书、类书看待,以编纂类书、志书的心态与方法来作赋的做法②。这根源于赋体的文体特性,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即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而且正如南宋史铸《会稽三赋序》中所云:“会稽之山川风物载于图经地志者,固不少也。然人一一泛观则兴易尽,屑屑遍读则神且疲。”③与之相比,赋对于城市的描写往往更集中、更典型、更能体现地域文化色彩,因而也就成为了解某一城市的重要窗口。也正因此,透过两千年的都邑赋创作史,我们可以感知出两千年的城市文明进程。“百城赋”在这方面即有着很好的实践。每一篇赋作都围绕着某一城市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文展开多角度摹写,无论自然物产,还是乡风民俗;无论历史掌故,还是发展新貌,都能以一赋而备览无余,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百城赋”,无异于一部关于中国一百个城市的详备而又精炼的地理专志。而当我们用心去品读这些赋,并且从这些赋中获取关于中国城市的综合知识时,赋这种古老文体的知识性功用再次被得到证明④。

需要指出,除了上面两点之外,“百城赋”还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赋体在其它多个方面功能、体性的认识。譬如它的艺术特点的当代接受问题,以及这种文体与现代社会的兼融问题等,都是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深入探讨而过去的确被过于草率地论述过的重要问题。限于篇幅,以及本篇论文的总体框架,我将会在下文中简要涉及,至于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则尚需有俟来日。

---

①《赋学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版,第 231 页。

②参见拙文《“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中国韵文学刊》,2009 年第 1 期。

③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七四七五,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

④参拙文:《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学术界》,2009 年第 1 期。

三、“百城赋”的期待

“百城赋”之广受关注,是新世纪之初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毋庸置疑,由于“百城赋”成于众手,而具体到每个作者,自身的文才学养各异,对于赋这样一种古老文体的认识程度和驾驭能力也会有一些差别,这就使得每个作者在驾驭赋体时会有一定的高下之分。加上报纸这种特殊的平面媒体的版面限制,有些赋作的质量并不一定如意。“百城赋”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

首先,如何提高当代赋作的典雅化。赋体在历史上就是一种非常典雅的文体样式。以四六句为主体句式的句法结构显示出汉语独特的章句之美,此外,还要讲句子之间的对仗、韵律①。既然要作赋,就必须要遵守基本的语体风格,不能随意植入新词,更不能随意打破声律节奏。像《西安赋》,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作对象,但赋的艺术水准却很让人失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欠锤炼,在很多地方过分通俗化,竟然出现了像“华夏古文明,好大一棵树”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句子。关于赋体语言的雅俗问题,程章灿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在现当代文学语境中,古典文体应当如何自处?是主动调整自身以应对,还是被动保守自身以自全?或是介于有意无意之间?就文学语言而论,在白话文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文言文应该如何自处?文、白之间应如何调停?……”②应当说,程氏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在“百城赋”中都已经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了。本着着眼于“尊体”的考虑,我们认为在当前恐怕还是要取“崇雅”一路。

其次,如何用文言表现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素材。历史上,都邑赋题材有一个“扬今薄古”的传统。而在“百城赋”中,一般也都在赋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铺写城市今天的发展面貌。这本无可厚非,而且大有必要。但问题在于,当读者读到这一部分时,总觉得很少有和前文风格协调的。关于这点,《芜湖赋》的一位主要撰稿人在《〈光明日报〉刊登的〈芜湖赋〉的写作经过》一文中曾经这样说:

> 但赋这种文体毕竟又有自身特殊性。你可以从历史入手,风景着眼,人文下笔,将我们这个城市既往的似锦繁花一一铺陈,豪情跌宕,意兴遄飞,一路高蹈而来,……不料到了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兴起三大产业、打造五大优势,特别要体现当代芜湖人得风气之先、奋发有为的创新创造及包容精神这个坎时,就把你小腰给撞了个不轻。无论是文风气势,还是叙述风格,如高台琅苑对水泥楼,前后根本无法统一。为此,市发改委给弄了一大袋资料,让我“钻研”。尽管如此,中秋节前夕在和县香泉谷修改会上,我还是明确表示,这一部分我确实无法调理好,就把皮球踢给了市发改委副主任周飞,请他亲自操刀。记得那一下午和晚上,我几次去看他时,他都是打了个赤膊关了房门在苦干。但效果也并不是太好。③

这位作者的体验很有代表性。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呢?作为古典文体的赋,究竟该怎样表现现代社会中的新事物,政府的蓝图规划,当下领导的“政绩”,是否值得纳入赋中,辞赋的阿谀特色是否应该“扬弃”。这也是个值得注意且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果可能,我们似乎可以从当年像黄遵宪这样的诗人用旧诗体写新事物的创作实践中汲取一定的经验。

第三,如何更好地展现地域文化特色,这似乎应当包括“百城赋”在内的城市赋创作所亟需解决的问题。在赋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南宋王十朋曾创作过《会稽风俗赋》,可是后来宁宗嘉定年间的孙因却认为此赋有三遗恨,未突出会稽特色,遂作《越问》④。可见古人对于在作赋时如

---

①参钱念孙:《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变》,《文学遗产》,1999 年第 3 期。

②《赋学论丛》,第 244 页。

③http://www.tc168.net/168285/index.asp?xAction=xReadNews&NewsID=5354。

④参见马积高《赋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56 - 458 页。

何准确地展现创作对象的地域特色,是十分重视的。而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行政区划虽有流变,但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稳定,往往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就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单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过大的行政区划调整。而各个地区小范围的区划调整,则相当频繁。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有些地方原来属于别的地方管辖,后来又独立。譬如湖南省的湘潭市,原来是属于长沙市,后来才独立建市。然而从文化上考察,它们又同属于一个整体文化单元。既然这样,在作赋时,如何努力发掘出“这一个”的特色,做到同中有异,异中见同?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我们在创作《北京赋》时,是应该考虑到它作为首都的独特位置,并以此为切入点;还是将其单纯作为一个北中国的大都市,着重发明其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相关内涵?在铺写城市胜概时,到底应该以“扬今”为重,还是以“厚古”为主?“扬今”的话,是写当下的成绩,还是领导班子拍板定下的各项措施蓝图?我们到底应该展现一个城市的现代文明,还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可以通过一定的外在形式传达出来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或风俗人情?抑或应该集中赞美当下的主政官员?公允地讲,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并非都已完善地解决,有些还比较突出。这或许会给赋体的现代复兴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在将来的创作实践中加以解决。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联系两千年辞赋创作的历史,我认为还是应当更多地展现一些能够代表某一城市文化品格的具有稳定结构的质素。礼赞现实,也必须要在实事求是基础上做到重点突出,务求经得起检验,留得下后世。

结　语

如果将光绪二十三年(1897)程先甲《金陵赋》的首次刊刻看作是古代都邑赋的终结标志,那么从那时算起,到2007年《光明日报》开辟《百城赋》专栏,中间已经隔着110年的光阴。这110年,是中华民族从濒临亡国灭种的绝境中,走向初步繁荣的110年。可以说,这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伟大复兴。为了这个任务,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前赴后继,矢志不移。在这个中心任务的统摄下,包括古代赋体文学在内的一切民族文化遗产都得被纳入怀疑、批判、否定乃至于摒弃的行列中。一切看起来“矫枉过正”的做法,平心而论,都值得一定程度上的赞同。因为对于传统的批判本身,其实也是中华民族寻求自强之路的艰辛探索,既然是探索,就应当允许曲折、徘徊乃至于失败。

时至今日,当这个古老民族已经初步摆脱落后局面的时候,我们也许真的需要重新回过头,审视我们民族的一切文化传统、遗产。因为我们毕竟从传统中来,我们无法割裂传统。而在新的世纪,我们已经有余裕,也有充分的鉴别力来对于这些传统作出更加客观合理的评价。《百城赋》的成功,让人们看到传统文化依然有着广泛的受众,依然能够将很多被掩埋已久的文化情感重新激发出来。而在今天的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能否珍视、尊重这种文化情感,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自身定位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金　城　jdxbjc@163.com]